

F-53

C44b

货币
金融
世界经济
——陈观烈选集



陈观烈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近照（1998年）胡凡摄影

第一篇 货币理论

货币重要吗？*

一、马克思两个基本公式的启示

一个事物值得人们花力气加以研究，必是因为这个事物对于社会发展有某种重要性。如果对于这种重要性竟有多种不同的见解，那更有必要通过研究以辨其真伪，这是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所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的货币和银行，正属于这种既重要又有人持不同见解的经济范畴，这是它们成为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根据。

马克思早就肯定了货币和银行对商品和资本再生产的重要性。他的商品流通公式和资本总公式是我们理解他的这方面学说的钥匙。

(一) 商品流通公式

“商品(W)——货币(G)——商品(W)”，这个公式是商品交换经常化情况下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仍有它的意义。式中，货币在形式上起着媒介商品交换的作用，而在实质上则是作为一般等价物以表现和解决商品内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资本主义把商品经济发挥得淋漓尽致，整个社会就是“庞大的商品堆积”，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都存在于商品内

* 原载《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5期，题为《西方国家货币与银行概论导言》，收入本集时有重大修改。

部的矛盾之中，如果这个矛盾不因货币的存在而获得解决，资本主义也就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这是货币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种正面作用。

商品流通公式还暗示着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负面作用，那就是，货币的介入，使商品交换可以分裂为“卖”(W—G)和“买”(G—W)两个在时间上、空间上和有关人物上没有严格限制的独立阶段。因而，就有可能产生只卖不买，即货币被储藏起来，而另一方面却有人持货待售或生产过剩的现象；也许再过一段时期，又有可能发生只买不卖，即货币从“沉淀”状态浮泛起来，造成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态。马克思从这里看出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驳斥了把商品流通混同于物物交换并由是否认有生产过剩可能的“萨伊定律”。

从统一的商品流通可以分裂为“商品—货币”和“货币—商品”两个独立阶段这一点透视出去，又可以看到银行作为信用中介在商品和资本再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它可以把前个环节所沉淀的货币吸取过来，输送给有意购买商品却没有购买手段——货币——的单位，从而恢复、甚至加速商品流通的进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①

当然，银行的这种弥合“卖”、“买”分裂的作用，也可能有过与不及的情况，即所谓“信用膨胀”或“信用紧缩”，两者皆不利于商品经济的稳定，这就成了银行的负面作用。如果联系后述资本总公式来看，这可能性几近于必然性。

(二) 资本总公式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货币的最重要作用，还是寓于这个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493 页。

会形态所特有的资本总公式中。“货币(G)—商品(W)——更多的货币(G')”，这才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特征，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集中表现，而货币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没有货币的这个地位与作用，资本的周转自无法进行。

鉴于货币是商品和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起点，马克思指出，当“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时，“一方面的货币就能引起另方面的扩大再生产”。^① 因此他又说，货币是“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第一推动和持续的动力’”。^② 当然，如果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不存在，那么，货币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推动力，不顾这个限制条件而继续注入货币，被货币所推上去的就可能不是产量，而是物价水平，或者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竞争的加剧和收益率的下降。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货币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

资本总公式不但显示了货币在剩余价值生产上的正面的作用和负面的作用，也意味着从事货币资金借贷业务的银行，既可以是资本增殖中的助推器，也可以变成资本躯体上的毒瘤。银行可以把社会上闲置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积累)，为一个个的资本增殖过程提供起点；银行又可以通过贷款或其他手段支持较强的资本在竞争中打垮和吞并较弱的资本，促进其集中；有时企业合并还有增效(Synergy)，即集中有可能同时增加社会资本总量，或集中可以兼有积累的功能。银行又可以创造信用，以加速上述积累和集中的过程。但信用创造过了头，便会酿成通货膨胀；信用创造不足，又有通货紧缩的危险。

资本总公式中所体现的货币生产货币(G—G')的关系，被庸俗经济学家神化了，并且因银行的存在而固定下来了。银行作为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3页。

贷资本的代表，所追求的正是 G—G'，这使它特别关心信用的扩张与收缩。然而，资本主义市场中，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信用过松和过紧的现象在所难免。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信用有二重性：“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①

综上所述，货币和银行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都会有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这些作用的由来，不是货币和银行有什么特殊的自然属性，也不是使用货币和开设银行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气质，而是由货币和银行所运行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市场经济及其特殊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赋予前者的社会属性。是这个制度规定了货币和银行的那些作用，而不是货币和银行产生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有人不作此区别，以为货币和银行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源，故而主张以取消货币银行的办法来防止资本主义的产生或复活。这是非常荒唐的。马克思说过：“资本关系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不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②

然而，西方的学者却是撇开社会制度因素谈经济问题。关于货币的重要性，他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从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相比所得的便利上来回答问题^③，从不接触商品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比如，有这么一种说法：设有 n 种商品参加交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49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39 页。

③ 关于银行，则从间接融资比直接融资的优越处来谈论其重要性。读者可以举一反三，不需我们多说。

则在物物交换情况下,市场上便有 $n(n-1)/2$ 个交换比例,如果有了货币,交换比例数目便可减少为 $n-1$,这就是他们眼里货币的全部奇妙作用。如此说来,货币不过是与人方便而已,就像著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所说:“货币是一种机械,迅速而方便地做着那些没有它也能做好的事情,只不过离开了它就做得慢些和不那么顺手而已。货币如同其他种类的机械一样,在它出了毛病的时候,才会产生本身的、明显的和独立的影响。”^① 马克思对这种用形而上学方法看问题的人有过批评,说他们“惯于从扩展了的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外部困难去寻求货币的起源,却忘记了这些困难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劳动的发展产生出来的。”^② 不管这种“忘记”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是看不见劳动的社会性,那当然就认识不到货币在商品的“生命旅程”中使后者实现其“惊险的跳跃”的重大作用,更认识不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意义,因而也就大大地低估了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关于 货币重要性的论争

不过,“货币是否重要(Does Money Matter?)”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争论甚剧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不是表明,已经有西方学者跳出上述“方便与否”的窠臼或者上升到与马克思主义一样的层次来探讨货币的作用,因而与西方的传统发生歧异。西方经济学家对货币的微观经济意义,依然是停留在“方便交易”的认识

① 约翰·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84年纽约版,第2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0页。

上；对货币的社会属性依然是讳莫如深。货币重要性的问题在西方被提出，只聚焦在一点上，即货币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工具，究竟是否有力量改变生产水平和物价水平。原来，自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随着经济危机深刻化而加强以后，西方国家力图利用货币手段来“烫平”经济周期或调节宏观经济，为此采用过多种具体的措施，却没有哪一种是持久有效的，这就使人产生疑问：国家货币当局是否能够通过变更货币供应量，如所预期地、有效地影响其他经济变量（收入、物价、利率等）的升降呢？这就是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四种不同的答案

对于这个问题，在西方有过四种不同而各有重大影响的答案。

第一种是流行于本世纪 30 年代之前的庸俗经济学，我们称之为“古典学派”（包括旧货币数量说）。这一派认为，货币（金融）领域与真实（商品）领域是经济中两个平行的部分；货币的主要影响发生在前一个领域内，所影响的是物价水平和名义利率。至于真实领域内的变量（如就业、产量、真实利率、相对价格），则主要决定于资源、技术、管理和生产率。换言之，变动货币供应量，对真实领域各变量不起作用，货币对这个领域来说是“中性”的，犹如“面纱”。

第二种崛起于大危机的 30 年代，是自称要革古典学派之命的凯恩斯学说（Keynesian School）。这一派认为，货币领域和真实领域是相通的，纽带就是名义利息率。具体地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可以通过压低名义利率而刺激投资，从而对真实收入（连带及于就业量）的增长产生乘数效应。至于物价水平，只要社会尚未达到充分就业，不会受货币供应的直接影响。不过，这派人又认为，货币供应量对利率的影响是有限的，投资对利率变化的反应也不总是很敏感的，因此，增减货币供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甚至不如财政政策之大，“货币有用，但用处不大”。

第三种在 60 年代抬头，锋芒对准已盛行了 30 多年的凯恩斯学

派，而自称新货币数量说，又称货币主义(Monetarism)，著名的旗手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一派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其重要性表现为，变动货币供应肯定要影响名义国民生产总值(GNP，即产量×物价)，不过在短期里和长期里对这总值里两个组成部分的影响不同：短期里产量和物价均受影响；长期里只影响物价，不影响产量。至于财政政策，如果不涉及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则不过是资金在公与私间的转移，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远不如货币政策。

第四种是 70 年代由货币主义的适应性预期假设所发展起来的理性预期学说(Rational Expectation Theory)及其孪生兄弟真实经济循环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理性预期论者认为市场行为主体都是理性的，他们不会犯系统性错误，而会在实践中掌握有关变量的正确平均值和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以准确地预计某种政策的效果，从而采取适当的对策予以抵消，因而使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失效，连货币主义所承认的短期增产效应也被否定了。和这个结论相结伴的就是所谓真实经济循环理论，意谓市场经济的产出波动是因技术扰动因素所引起，而非外生的货币变量所造成^①。对于统计上常常显示出来的货币数量与 GNP 的相关性，真实经济循环论者另有种种解释——有人(如 C. I. Plosser)认为是 GNP 的变化强烈地作用于内生货币(Inside Money，即私人金融系统适应社会需要而创造的信用货币)，也即是 GNP 变化带动货币总量的变化，而非货币数量变化刺激了经济增长；有人(如 Valerice A. Ramey)认为金融系统的业务如结算也是生产中一种真实的投入项目，和技术扰动因素在性质上没有很大差别，虽然看起来货币数量与 GNP 正相关，其实是金融业务这种真实投入造成货币量与 GNP 的联动；还有人(如 B. T. McCallum)不得不承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会对产出发生影

^① 参阅巴罗主编：《现代经济循环理论》[美]，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响,但作用不如一般想像那么大。^①

这四个不同的货币重要性论点,可以用三个 IS—LM 图形表现如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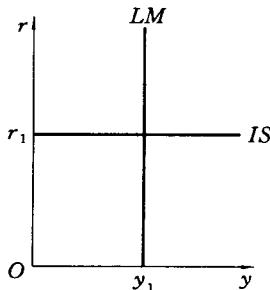


图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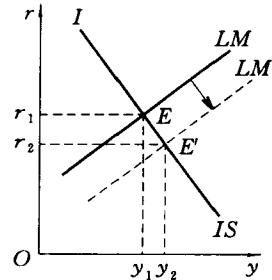


图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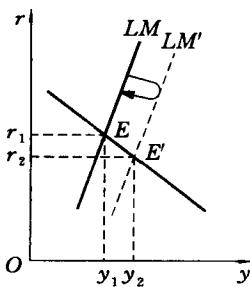


图 c

上面各图均假定货币单位为一定量的购买力(即真实货币)而不是元、镑、法郎等一定量的面值,因此,横轴的收入是真实收入,纵轴的利率是真实利率,LM 是为实现真实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均等所必要的各种利率与收入额的组合,IS 是为实现真实储蓄与真实投资均等所必要的各种利率与收入额的组合。如图 a,名义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只引起物价水平的同比例上涨,则真实货币量仍与以前一样,LM 线不动,真实利率和真实收入仍分别为 r_1 和 y_1 ,这就是古典学派所

^① 参阅 Valerie A. Ramey 在《货币经济学杂志》(第 30 卷第 2 期,第 171—193 页)上的著文。

^② 关于 IS—LM 图式的推导,读者当已从初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得知其详,无庸本文赘述。

持又为当代理性预期派所重新表述的“货币不重要”观点。如图 b，名义货币供应量增加后，物价水平不变或其提高程度不及货币量增长率，则真实货币量有增加， LM 线右移，均衡点由 E 变为 E' ，利率和收入分别变为 r_2 和 y_2 ，但 y_2 比 y_1 多出有限，这就是凯恩斯学派所持“货币有用，但用处不大”的观点。如图 c，名义货币供应量增加后，短期里既有物价水平变化，也有真实收入变化，但长期效果只有物价水平与货币是同比例变化，而无真实收入变化，则 LM 先右移、后又退回原位， r 和 y 分别回到 r_1 和 y_1 ，这就是货币主义者从名义收入变化意义上说的“货币至关重要”。

（二）四种答案的不同时代背景与理论假设

以上四个观点各有若干支派，从极端的“货币全无用”到“唯有货币有用”，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这里谈的是作为主要代表的派别。为什么会有各派的分歧呢？这是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也由于理论假设不一样。

先谈时代的不同。

古典学派盛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并延续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初期，这时候金本位制还在运行，货币供应基本上取决于黄金存量和对外收支状况；有一种自动的“货币纪律”，要求国内的经济稳定服从于国际的汇率稳定，政府不能任意增减货币数量；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只限于维持市场经济的外部秩序，而极少介入到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来，因此，不需要也看不出货币作为一种受控的因素对真实领域发生作用。

凯恩斯学派反映了 30 年代大危机后的局势。这场危机尖锐地提出一个失业和银行信用动摇的问题；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所遗留的一些制度、主要是金本位制度也被冲垮了。在不兑换纸币本位制下，没有外来的货币纪律约束，政府取得了对货币供应和金融秩序的最大控制力，这在许多人看来就是相机运用货币手段以调节

经济运行的新制度条件。但是，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留下了很难抹去的捉摸不定局面和恐慌心理，还有金本位制的残存影响（如纸币发行的黄金准备制），这些却使政府的货币政策不能充分发挥其能量。到了特种萧条刚刚过去时，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立即在战时财政的刺激下出现了经济景气，人们只能由此得出货币“有用”，但用处不及财政的结论。

货币主义又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庞大的战时递延需求，欧亚的重建任务，再加上生产技术的长足进步，使资本主义世界不但未再现 30 年代的大危机，且有着和平年代前所未有的长时期持续增长。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这应归功于凯恩斯经济学。但这增长最后却落得个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在 70 年代演变为“滞胀”。这就使人对凯恩斯学派所鼓吹的“廉价”（低利率）货币政策产生怀疑，连许多凯恩斯学派中人，在滞胀面前也感到难以辩解。于是，适应于反对政府干预和反通货膨胀的历史潮流，力言必须控制货币总量的货币主义政策主张，便受到了重视。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在许多西方国家相继改用货币总量取代利率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货膨胀果然有所收敛，这更增大了货币主义的声势，理性预期论也乘势而起。

但是，货币主义的风光日子没有持续多久，80 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又发生了重大转折，主要表现是：通货膨胀虽有明显缓和，但未完全消失；而经济增长率则大大下降，失业率持续高昂，利率居高多变，利率居高多变又严重损害投资环境和扰乱国内、国际金融，包括妨碍汇率的稳定。这时候，如果继续坚持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办法来清除通货膨胀，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国内、国际金融危机。形势逼得许多西方国家当局悄悄地改变只控制货币总量的做法，而重新把政策重点放到利率控制上来。有人因此高呼，货币主义已经“退潮”，理性预期论是空中楼阁，凯恩斯学派正在复兴。但是，货币主义者尚不认输，反说是各国推行货币主义不力所

致。很难说哪一派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①。

再看四大学派在理论假设上的差别。

古典学派之所以认定货币除影响物价水平之外不对真实产量起作用,是因为它有这么三个假设:

第一,市场经济有内在的稳定机制,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价格变动作出调整,使市场上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都能卖得掉(清理),资源总能配置在合理的格局内,也就是说,市场经常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中。

第二,货币的职能仅是充当交易媒介,因此,“卖”之后必定继之以“买”,没有货币的滞留;也因此,商品流通和物物交换只有方便与不方便之分,没有本质的差别。“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便是由此被提出来的。

第三,对货币的需求,只由真实领域的交易额或收入(GNP)决定;货币供给量如果超过了货币需求量,只能是和必然是通过物价水平的上升来加以平衡。

凯恩斯不同意这些假设,而代之以新的假设,即:(1)市场经济不能完全适应外界的变化,因为物价有“粘性”,至少有一种物价(劳动力价格)是如此,所以,不能保证市场总能得到“清理”,也即是有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存在。(2)市场不是完全透明的,未来是难以捉摸的,在许多问题上只能按自己对未来的预期行事,但是预期又不可能是绝对准确的,所以,经济动荡就不可避免。(3)货币除了充作交易媒介外,还有一个主要职能,即储藏价值的手段。所以,在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便有多种不同的动机,交易动机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而尤其重要的是投机动机,即人们依据现实的和预期的市场利率之不同,而在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之间进行替换,利率因此成了决

^① 参阅拙文,“论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学术月刊》,1992年第4期。

定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最后,(4) 凯恩斯学派又假设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较大,而投资的利率弹性则较小,所以,增加货币对利率下降的影响较微,利率下降所能诱发的新投资也为数有限。结论就是货币政策作用不大。

货币主义重申新古典学派所强调的市场内在稳定性假设,为此,他们又提出经济行为主体有适应性预期能力的假设,用以缩小市场的不确定性;提出“自然失业率”的假设,用以否定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提出恒常收入的假设,用以论证货币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并由此推论货币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稳定可测关系;提出货币需求与其他资产需求受相同因素制约的假设,用以缩小利率因素,而提高收入和价格因素在货币需求决定上和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作用。这些假设,使弗里德曼等得以把古典派所云货币无补于真实产量的结论“再表述”为长期现象,而突出了货币在决定长、短期名义收入变动中的重大作用。

理性预期和真实经济循环论者,又比货币主义更进一步,他们假设:第一,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不是适应性的,而是理性的,即不仅是由过去推知将来,而是同时根据某种理论或经验所形成的模式去判断将来,意即预期不会长久有误;第二,由上又假设,当货币供应量变动时,工资与物价的反应是即时的,没有时滞或粘性,故产量不受影响;第三,为了回答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社会产出在短期或长期内确有变动的事实,理性预期论的主将卢卡斯(Robert Lucas)又假设,每个行为主体往往难以分辨出需求的变化是来自总支出的增减还是对各种商品的相对评价有变化,当这种假设又遭到更多人的驳斥时,真实经济循环论者则假设,产出的变动是出于技术原因,总之是货币政策无效。

各派的不同理论假设,孰是孰非,当然要由事实来检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更详尽的史实和更丰富的统计资料,每个学派也力图从经验证实中肯定本

派之“真”和指出他派之“伪”，但迄今没有哪个学派取得完全的胜利。例如，凯恩斯学派曾经言之凿凿地举出 30 年代美国短期国库券利率曾降至 1% 以下而不能把美国经济从萧条中拔出来的事，说这就是有钱无人借，证明货币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确是无大用。到了 60 年代，弗里德曼等在 30 年代大萧条历史上做起反面文章^①，说当时经济不景气拖长，是由于联储的放松银根政策半途而废，没有充分满足恐慌中的银行对资金的异常需求，名义利率虽然很低，真实利率却很高，所以这段历史恰恰证明货币有用而没有被利用。70 年代，又有凯恩斯学派中人站了出来^②，说当时有一些非金融的原因（如农业危机和许多银行因舞弊而倒闭），使收入和货币供求同时下降，依然是表明货币无大用。历史验证看来还难以判断是非，于是，西方经济学界便转而求助于模型的构筑和统计验证。自 60 年代末期以来，凯恩斯学派和货币主义各按自己的理论建立计量模型，前者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宾州大学和联储合作设计的大规模 MPS 模型为代表，后者有著名的美国圣路易联邦储备银行的简化模型。两个模型还在继续改进之中，也已得出一些使双方立场相互接近的验证，但根本的分歧并未消除，甚至计量方法上的争议超过货币理论上的交锋。

为什么这个货币是否重要的问题如此难于解决呢？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各个西方经济学派都有片面性，二是货币和以货币为基本对象的金融机制有其浓重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而且越来越复杂了。

各派观点的片面性，从上面的简介中已不难看出。他们有的只谈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有的则把货币的重要性全寄托在储藏价

① 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是 M· 弗里德曼和 A· 斯瓦茨合著：《1867—1960 年美国货币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 年版。

② P· 提明：《是货币的力量造成大危机吗？》，诺尔顿出版公司，1976 年。

值的职能上；有的用狭义的货币概念，有的用广义的货币概念；有的过分强调人的主观动机，有的则把问题推给“自然”；有的从长期着眼，有的只作短期分析；有的看历史的这一侧面，有的看历史的那个片断。只要留心比较，不难发现，这些学派之间的论争，有如盲人摸象。共同之处，是在不等程度上犯着三个毛病：

第一，只满足于事物的技术性表象，而未深究事物的社会性本质。新古典学派把货币看作“面纱”，是其一例；凯恩斯理论所倚重的是几个没有社会属性或阶级烙印的心理动机，又是一例；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分别强调利率和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这都似是“大发明”，实际上抽掉了货币资本借贷与价格形成作为社会现象的一面。

第二，只重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而讳言市场经常受“外生力量”的干扰，所谓“看不见的手”，曾被西方庸俗经济学视若神明，古典学派正是因此而认定充分就业均衡的。虽然 30 年代的大危机和持久萧条逼得凯恩斯不能不承认市场无法保证充分就业，但是货币主义者又想用“自然失业率”来加以掩盖。即使是凯恩斯，在承认市场有缺陷的同时，至少对一个市场、即金融市场仍有幻想，认为利率只决定于货币的供求，货币数量与利率之函数关系可以用一顺滑的曲线表示。其实，金融市场上银行家也不总是按利率“标卖”资金的，经常实行的是受社会关系制约的“信用配给”。像机器自动运转一样的市场机制，至少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是不存在的。

第三，只有静态经济分析，没有历史观念。新古典派从萨伊那里承袭下来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定律，其要害就是把物物交换同商品流通这两个大不相同的历史概念混为一码事。凯恩斯虽然在表面上否定萨伊定律。但由于他认为，只要用财政或货币政策补充有效需求，产出就会增长，这实际上就是说，需求可以创造供给，与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命题可谓异曲同工。但七八十年代的“滞胀”现实恰恰证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不仅有同一性，更重要的是有矛盾，这就把古典派和凯恩斯学派统统否定了。货币主义者为了